

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持续发展：以金昌为例

邱泽奇

西部地区的欠发达以及整体发展中东西部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持续发展中的一大难题。1984年，在列名的225个贫困县中，西部地区就有134个，占59%以上，这还不包括国家另作安排的甘肃中部、宁夏西海固，即“三西”地区和西藏全境。西部11省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0%，人口占全国的近30%，而198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16%。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是东部10省市平均的36%^①。

1978年以来，这种差距仍在不断拉大。根据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研究，1985—1988年，国家重点扶持了328个贫困县，使乡村人均社会总产值由402元上升至663元，但与同期全国水平相比，每年却以6.3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扩大差距。以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例，西部11省区1980年为17%，1989年降至13%。

在这样的地区如何着眼于持续发展来发展经济与社会，并以较快的速度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之间在发展上的差距呢？甘肃省金昌市的个案也许能为我们

提供某种启示。

一、案例

金昌市地处黄河上游河西走廊东段、祁连山北麓，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历史上，那里曾是商旅络绎不绝之地，但是在近代，昔日的繁荣逐渐消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那里没有工业。虽然历史上曾是郡守之地，但直到1911年，境内也只有铁匠、木匠、毡匠、褐匠、陶匠、刻字、木刻印刷、织布纺线、裁剪缝纫、裱糊、副食品加工等个体小作坊40多种，并主要集中在原永昌县城。方圆9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不到10万人，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只有460人。到1965年时，全市人均纯收入只有53元。而当时甘肃省的平均值是98元，全国为107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1952年的农业总产值占到了96%，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当时甘肃省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分别是78%和90%，全国的平均值分别是57%和83%。由此看来，那时的永昌县（金昌市的前身）不仅在全国算得上是穷县，即使在

落后的甘肃省也算得上是穷地方了。不仅如此，在整个永昌县农村，除了祁连山、焉支山以外，一眼望去，只能见到几棵老枯树，人称鸟儿也没有落脚之处，更别谈什么森林覆盖率了^②。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个金昌市。到1990年时，尽管全市的人口增加到37万，人口密度从1943年的5人、1953年的13人，增加到40人，农业人口增长了2.6倍，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从4.5亩下降到了2.8亩，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从2.7亩下降到了1.7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从89%下降到了70%，但是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却增长了15倍，农村人均粮食占有增加了2.8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了601元，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了9.4%，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了61%。而这期间，甘肃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到了402元，全国的平均水平为629元。比较而言，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应该说金昌市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通常人们把欠发达或贫困描述为人口、生态、经济、教育之间恶性循环，认为人口的增长导致环境的超载、生态的破坏、经济发展的迟滞、教育的落后，进而又导致人口的增长并进入新一轮恶性循环。就金昌市的人口而言，1991年与1949年相比较增长了3.7倍，这个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和甘肃省的平均水平。如果1991年全国人口以12亿计也只是1949年的2.2倍，甘肃省同期的增长也只有2.3倍。那么金昌市的发展是如何突破这种人口增长与发展之间恶性循环的怪圈的呢？这种突破对当地的持续发展又会构成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从一些基本事实入手吧！

二、驻地大企业的意义

就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而言，有人主张西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二元问题，认为西部的工业化是在区内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化要素缺乏的条件下，主要依赖区内单一的资源要素和区外的经济资源（资金、技术、熟练劳动）的嵌入而形成的，并由此形成了主要以城市为载体的西部现代工业与以广大农村为载体的传统农业所构成的总体二元结构和在这一二元结构内部以中央投资发展的现代工业与地方投资兴办的地方工业在城市并存、传统落后的原始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在农村中并存的双层二元结构。人们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有人甚至把这一现象与本世纪50年代意大利对其南部地区的开发相提并论。

的确，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国家的力量在从中部到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投入了3700亿元的资金，建立了几千家大中型企业，仅职工就有1600万，占“三·五”到“四·五”期间全国国营企业职工总人数的近1/3。除了战备的目的之外，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当地的工业化^③，只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大中型企业与地方经济的融合程度、一体化程度极低，不仅没有起到工业化发动机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一个个企业孤岛的形成。金昌市在发展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958年，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的队员在永昌县发现了中国工业生产中的稀缺物质——镍，还有铜和其他金属元素。镍是国际上公认的战略物质。正因为如此，国家花了极大的力量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大型的有色金属采选冶联合企业。1964年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正式投产，到一期工程和一期扩建工

程完成时，国家累计投资达 12 亿多元，二期工程投资则高达 20 亿元^④。但就是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虽然地处永昌县境内，在计划体制下却并没有给地方的发展起到多少推动作用。就企业而言，一切的活动都体现在输出和输入上，粮食、配套原材料、生活用品，甚至连大白菜都可以动用列车从外地运进，一切的产品都直接作为任务从工厂输出，因此，在形式上，金川公司就成了一个黑箱。

不过，在黑箱里生活的也是人，他除了工作以外还要生活。大白菜可以从外地输入，水却不得不靠当地供应。换句话说，虽然金川公司可以是一个封闭的生产与生活体系，但这种封闭性却割不断其与当地的地缘联系。不幸的是，永昌县在行政级别上低于金川公司，因此也只能充当服务的角色，而无法与金川公司平等对话，更别说要求金川公司为地方带来点什么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那时天天都在讲社会主义觉悟，但穷极了的农民仍然不断地“骚扰”公司：拆围墙、偷材料。

尽管如此，对地方而言，大工业的嵌入让一辈子不出庄稼地的农民开了眼界，让他们看到了庄稼地以外的世界。费孝通教授有过这样一段话：“一生没有离开过自己村子的中国农民是不会相信吃饭是能不用筷子的。他既不愿意用手抓饭吃，也想象不出可以用刀叉吃饭。在他，用筷子吃饭是件自然的事，就好比用腿走路一样。但是如果他有机会看到别的社会里却有用手抓饭吃、也有用刀叉吃饭的人，他就会开始明白用筷子吃饭只是自己从小学会的一种吃饭方式罢了。他甚至开始动脑筋问几个为什么了。”^⑤虽然他讲这段话的本意是在说明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但也道出了见识的重要性。因此，现代工业在欠发达地区嵌入的第一个基本意义就是让当地的农民有机会看到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东西：现代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当

地的经济发展而言，也减少了学习现代工业的费用或者说减少了发展成本。同时，这些大型工业的资金、技术、物质与市场也是其所在地区的重要储备。

1978 年以后体制的变迁为这些大中型企业存在意义的表现和储备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也为其所在地对这股重要力量的运用提供了众多的机会。用金昌人的话说，金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益于此见识，更受益于那些大中型企业的力量储备。

三、乡镇企业与生态农业

乡镇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是 1978 年以后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10 多年来，农民利用人力资源优势走出农业领域，以为数不多的农业收入办起了 1000 亿产值的乡镇企业，吸纳了 1 亿多人就业^⑥。在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在全国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在广大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金昌市的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直到 1981 年才实行。1981 年时金昌市的乡镇企业只有农业机具修理、砖瓦、粮油加工等行业，总产值 967 万元，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份额不到 10%。到 1991 年则建成了矿山开采、建材、建筑、轻纺造纸、农副产品加工以及服务业、饮食业等各类企业 950 家；从业人员达 2.5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21%，每两户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在从事乡镇企业；总产值达 1.5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40%；在农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占到了 60%。

数字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问题是这些数字的获得及其所蕴涵的意义。换句话说，问题是金昌市是如何获得这种发展的，它对那里的发展与持续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

与中国广大的农村一样，金昌市乡镇企业的源起仍然是人口与土地矛盾发展的一种自然。农业的八字宪法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中前四项最为重要，西部人口的人均占有土地很多，但占有的水资源却奇少。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年均降水量都在 1300mm 以上，而金昌市降水最多的年份也不过 350mm，少的则只有 140mm，境内的地表径流水资源也极其有限。水资源的有限制约了金昌市农业对土地的利用，同时也限制了土地人口承载量的扩展。

在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承载力有限、国家政策容许的情况下，金昌市抓住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从金昌市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中我们发现工业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饮服务业占绝大多数，产值结构亦如此。通过对各企业门类沿革的调查表明，1981 年以后发展的占非农产业的绝大多数，产值份额和从业人员的比重亦如此。如前所述，1949 年以前，那里是一个地道的农牧区，1981 年以前也只有农机修理、砖瓦、小煤窑和采矿等行业，10 年之内何以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呢？并不是那里的农民在一夜之间学聪明了，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了现代工业移入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资金、技术、市场储备的力量。

金川公司以及建设金川公司的中国有色金属第八建筑公司所从事的主要是采、选、冶和工民建。金昌原本没有采矿业，根据民间调查，只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蒋介石迁陪都于重庆，使部分工业迁往内地包括甘肃，金昌的部分地区才有了小煤窑，但并不构成产业，而是为富人占有、开采以供取暖，1981 年时的原煤产量仅为 5 万吨，到 1991 年时则达到了 25 万吨。其实，金昌市境内富有矿藏，目前探明的除有镍、钴、铜、铂族元素以外，还有煤、膨润土、滑石、萤石、铁矿石、硅铁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藏。1981 年以后金

昌市就是利用金川公司的采矿技术和土地上剩余的劳动力优先发展了采矿业，利用金川公司等大中型企业中存在的庞大的配套产品市场发展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饮服务业，充当大工业技术、设备的扩散地，进而积累资金和技术，抓住本地市场开发、创新，如农用地膜、建筑涂料、水泥产品等，都有“填补空白”之功。

农业人口的转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人地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条件。人地关系的调节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轮歇制度。在农业中轮歇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保持地力，在人们寻求到了可以代替轮歇制度的办法时，轮歇制度也就失去了绝对的意义。在农作物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因为人口压力的减轻和其他收入来源对土地利益的替代，金昌农村所表现的人地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这一方面表现为肥料、种子的科技对土地的替代，另一方面表现为种植业结构内部在向培植地力的方向调整，还有一方面就是绿色覆盖面积的扩大。这种改善不仅没有减少农民的收入，相反却给农民带来了更大的利益。这里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些指标来作简单的概括。

就种植业而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从 89 : 11 下降到了 70 : 30，在粮食作物内部，禾本科等消耗地力的作物的面积逐渐减少，养地的豆科和不那么消耗地力的马铃薯面积不断扩大。就非粮食作物而言，面向城市、工厂的蔬菜、瓜果面积不断增加，农民从土地中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依靠非粮食作物，特别是高商品率的蔬果类。就农业科技而言，各类农作物的品种更新速度加快，种类得到扩展，在缺水的黄土地上还出现了养鱼专业户，间作、复种、施肥和植物保护技术得到了推广，各种农作物的单产不断提高，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从 382 斤增长到了

702斤，其中玉米的单产提高了近一倍，非粮食作物类中蔬菜单产提高了4倍，西瓜的单产提高了3倍；就林业生产而言，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10多年中，实有森林面积增长了54%，其中人工造林面积增加了2.4倍。所有这些都为该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人力资源与“三废”利用

有人曾对西部的1445家占主导地位的三线大中型企业进行过调查，其中经济效益不好的占45%，已经没有发展前途而需要关、停、并、转、迁的占7%，两项合计为52%^⑦。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是事实，但它不仅仅存在于西部，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问题，但是否需要关、停、并、转、迁，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有人说，国有企业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是成本过高，明白地说是人力成本过高，工资只是企业所承担的人力成本的一部分，大部分则分解到了具体的细节中如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生活设施以及为此所投入的全部成本。如何降低这些成本以提高企业效益，这是1978年以来所有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金川公司。

通常认为，企业的发展有两种最基本的模式。一种是数量投入型的发展模式，它重视投入的数量，在技术要素的投入中忽视软技术的投入，追求产出的数量扩张，忽视产出的经济效益，总之，这种模式忽视科技要素在推动企业生产要素中的优化配置和提高企业效率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使得企业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弱，因而构成有增长而无发展。另一种是所谓科技先导型发展模式，它注重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投入的整体性、生产要素投入及其发挥效用的协调性、生产要素产出的效益性。换句话说，它注重企

业科技进步要素及其成长的内在规律，使科技在企业发展中起主导、创新作用。从整体发展来看，金川公司选择的是后者。但是这一模式没有解决企业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解决人力成本问题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压薪，二是裁员。此外，没有第三条出路。很显然，这两条路在西部的企业都走不通。工人的工资不高，压薪不可能；在企业的性质完全回归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之前，企业还有另一个目标即维持社会安定，所以裁员不现实；即使企业的性质完全回归了，在金昌市那样一个典型的企业型城市，裁下的人员除了种地以外还能干什么？其实早在60—70年代，在“五、七”道路的指引下，为解决企业人口压力问题，金川公司还真的办过农场，但工厂办农场，特别是那种兵团式的屯垦农场到底不是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不然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化呢？为此，企业的一些二级厂矿为了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办起了所谓的“家属工厂”、“集体工厂”，利用大企业闲置的设备和大企业看不起的废矿石、矿渣安置人员就业。那些所谓的集体工，没有固定工资，没有劳保福利，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却不断地用自己的双手生产出了一批大企业所需要的备品、备件、劳保用品，有的仅仅用几口大锅竟然从大厂倾倒的残渣中，熬出了黄澄澄的硫磺。在公司地处甘肃的另一家有色金属公司白银公司，我亲眼见到了这样的工厂：露天下置着两座土炉子，来自周围农村的农民和大企业自己的待业者或集体工把大冶炼厂倾倒的废矿渣往炉子里送。根据那个厂的负责人介绍，80年代中期以后，就是那样的土炉子，把大冶炼厂堆积了几十年的废矿渣全部消灭了，每年从废矿渣中炼出1000多吨粗铜。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金川公司的集体

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从 1988 年到 1992 年上半年，职工人数从 3522 人增加到了 1.7 万人，与金川公司的全民职工人数平分秋色，其中有 5000 名职工是大企业精简出来的“富余人员”。从 1986 年以来，金川公司集体企业所创造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 57%，实现利税年均增长 55%，到 1991 年已经发展了 115 家厂矿企业、160 多个商业网点，开发新产品 40 余种，完成社会总产值 3.6 亿元。如今，集体企业中的大多数已不再是过去的土炉子、铁锅了，而是在向原材料和“三废”利用的深度发展，如铜管厂的内罗纹冷凝管和电焊条厂生产的纯镍焊丝，都是国内的技术领先产品。

大企业中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大企业的人力成本，促进了大企业的发展，而且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机会。根据国家政策，集体企业的税收都缴归地方，1991 年金昌市地方税收的大部分来自于集体企业。地方政府财力的扩大和本地的资源与市场的广博，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去发展地方经济。到 1991 年，国有企业的和地方的集体企业已成为当地工业的主导力量，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的西部地区而言，如果说发展意味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与全国同步的话，那么持续发展就意味着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简言之，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金昌市这种建立在“三废”利用基础上的人力资源开发对这个地区的发展与持续发展的意义就不可低估了。

五、讨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持续发展

就亚洲的工业进程而言，有人将它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区域类型。第一是该地区有优越的区域优势，有相对发达的工贸传统，能

够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快速的现代化。第二类是该地区的传统工商业有稳定的发展，可以积极地适应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类地区以本土型的发展为核心，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第三类是该地区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十分牢固，能够有选择地接受西方式的现代化，在那里西方式的现代工业是作为一种刺激物或嫁接物而存在的。第四种类型是该地区具有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基础，对西方式的现代工业只能逐步地部分地接受，因为在那里西方式的现代事物并不总是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第一种类型大多是都市；第二种类型是与沿海地区毗邻的内陆地区，特别是中小城镇；第三类是内陆农村；第四类如中国的西部地区。因此，很多学者就把西部归结为了一种不愿意工业化的欠发达地区。但金昌的例子却告诉我们，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特别是一个技巧性的过程，立足于本地资源起步的发展路子虽然不是金昌创造的，但却在金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有人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概括为五点：第一、自然条件长短互见、资源开发难度较大；第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内发展极不平衡；第三、中央大型企业比重高，但与地方经济的融合程度低；第四、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较强，但运用资金的能力较弱；第五、经济发展的相关条件差，已有的条件利用效率较低。我们不能说这种概括不全面，问题是不十分确切。金昌的例子说明，西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不是外力，而是内发的发展，大中型企业的力量不是不可以融合，而是双方都要有要求。而资源的开发则是一个技术问题。西部的大中型企业大多是原材料工业，开发资源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问题是借用与学习的方式和途径。

也有人认为西部的欠发达主要是那里的人素质太差。应该说，教育与经济是一个追求相互边际成本的过程，如何使用教育的投

入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在我们看来，教育优先并不为错，但大量的教育投入得不到利用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对国家而言，教育是一个长远战略问题，但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教育则是一个追求边际效益最大的过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城里的人“不断追求进步”，上夜校、上走读，而在工业不发达的农村读上三年级初小就可以辍学的原因。城里人常说：“不学就不会，就弄不懂。”农民却说：“只要能认识数字、钞票，会加加减减，不被骗就行了。”这就反映了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在金昌，我们同样看到了经济发展同教育之间的关系。1982年人口普查时，金昌市每千人中大学毕业人数的比例是5.37，高中73.29，初中173.28，小学361，文盲与半文盲298.2；1992年则分别为16.2，106.4，246.7，395.5，和211.7。其中城市中高文化程度的比例依次高

于农村。

在我看来，金昌市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步迈向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和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地方和驻地国有企业中集体企业的发展均离不开这种改革的政策引导，只是我们把它当作了一个大背景、一个同一的隐含变量。改革的深入无疑将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持续发展产生绝对意义上的主导作用。

如果我们把发展看作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进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围绕人的问题来讨论、分解这种进程。事实上，发展或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以人的活动为表现形式的。人与非人力资源的结合就构成了人类的生产活动、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人与人的冲突，冲突方式向间接的转变和冲突激烈程度的改善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那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

注：

①参见邱泽奇《农村贫困现实解释之尝试》，《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2期；郭凡生等：《贫困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邹蓝：《巨人的跛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参见金昌市地方志办公室《金昌市志》（初稿），金昌，1992年。以下所引关于金昌的数字均来源于《金昌市志》和相应年代的《金昌市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③参见邱泽奇《国有大企业和企业型城市的集体企业》（博士论文），北京大学，1994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④参见邱泽奇《国有大企业和企业型城市的集体企业》（博士论文），北京大学，1994年。

⑤参见费孝通《再谈人的研究在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杜润生：《发展非国有经济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稳步过渡》，《经济导刊》1993年第3期。

⑦向嘉贵：《大三线的调整》，《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 张小路 何频